

• 医史文献 •

杨尧章论治温疫的特色

朱 传 湘

(湖南中医药大学,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 113 号, 410007)

[摘 要] 杨尧章为清代湖南名医, 撰有《温疫论辨义》。杨氏论治温疫以吴又可《温疫论》为正宗, 并对《温疫论》逐条剖析, 于当从者, 疏其蕴; 于不当从者, 抉其蔽, 使之治温疫提纲挈领, 多有发有性未发之论。杨氏对温疫论进行了辨义, 并从温疫初起、感邪轻重、温疫治之大法, 辨识温疫与温病的区别; 从感气、传变、证候、治则等方面辨别伤寒与时疫之异同。

[关键词] 杨尧章; 《温疫论辨义》; 论治; 温疫

杨尧章, 字芝樵, 清代道光至咸丰年间湖南长沙人。杨氏所处时代正是温疫流行之际, “道光己酉、庚戌两年, 湘中时疫流行, 兼值下游遭水难民, 流离省会, 塞巷填街, 十人九病, 忧骸载道, 惨不可言”(《温疫论辨义·胃气论》)。杨氏熟读吴又可所著《温疫论》后发现, 该书虽能揭明邪伏膜原附近, 于胃为表里之分界, 法以治里为主, 里气通, 伏邪自由里达表, 然最忌辛温发散, 确切详明, 诚千古不易之定义也。但杨氏认为, “夫同一证, 也有体强体弱之分, 新病久病之异, 专主下夺, 体强者生而体弱者死, 新病者生而久病者死。论中虽云四损不可正治, 卒亦委之无术挽回, 又何怪宗之者恨其法之未备, 转疑其于义未协哉! 余于审脉辨证之余, 察本气而悟病情, 临机应变, 于又可论中所未发者, 间有千虑一得, 随时笔记, 积累成编, 迩来居间, 复为删定。窃意抒一己之见, 独为一家之言, 此好名立异者所为, 反没又可之苦心, 淆后学之宗旨。”(《温疫论辨义·自叙》) 此言足以反映出杨氏立论之主旨。现将杨氏论治温疫的学术思想简介如下。

1 立温疫论辨义

杨氏有感于温疫一证, 自仲景以下, 前人论之者多, 但切合临床实际者少。至明末吴又可《温疫论》出, 始有发明。但杨氏在《温疫论辨义·凡例》中认为, “又可论温疫传里, 只有阳明胃一条, 至三阴则略而不讲, 创立六经分治之法, 自矜心得, 不知六经皆受气于胃。胃为六经之母, 母病移子, 母安而子俱安, 法以治胃为主。”^[1]杨氏于临床历验之, 认为邪越阳明居多, 少阳次之, 太阳其次。若离膜原而内陷于胃, 是为火实胃中。胃为十二经之海, 火郁于中, 十二经受困。故火乘心肺, 发狂谵语, 口臭气粗; 火乘肝脾, 扬手掷足, 逾垣升屋; 火乘肾水, 目睛直视, 烦躁不眠, 所谓中土者, 万物所归, 邪归胃府, 府之为言聚也。火愈聚则愈炽, 水谷莫能容,

气血无从化, 是生死一大枢机。伤寒由卫及营, 邪从太阳递传, 自表入里, 故发热而兼恶寒。惟疫邪从口鼻直趋中道, 不由外廓, 始则凛凛恶寒, 继则纯热而不恶寒。其见证不同, 故其治法各异, 学者当详辨之。

杨氏进一步从温疫初起、感邪轻重、温疫治之大法, 辨识温疫与温病的区别, 现将其根据吴又可论治温疫初起之症提出的辨义为例证其辨义要点: “温疫初起, 舌显白苔, 胸胁苦满, 人事恢恢, 语言不爽, 或头眩鼻塞, 或痰壅气促, 或手足微厥, 遍身疼痛, 先憎寒而后发热也。疫毒蒸郁于上, 而舌苔纯白, 头眩鼻塞; 阻滞于中, 痰壅气促; 浮溢于筋络, 而肢体疼痛, 微见厥逆。凡此皆由邪气固蔽, 阳气抑而不伸, 表里为邪所束。故起病之时, 必先憎寒, 迨阳气郁而忽通, 则与邪混而为一。发热而不恶寒, 日晡益甚者, 申酉戌为阳明胃旺时, 邪气乘之而愈炽耳, 且浊邪上干清道, 令人神志皆迷, 故人事恢恢, 语言不爽。其脉不沉不浮而数, 右关为盛, 亦间有全伏者。惟达原饮直达病所, 兼能鼓动胃气。俾中樞转运有权, 疫邪由是表里分传, 洵人乎第一良方也”(《温疫论辨义·温疫初起》)。由此可知杨氏辨温疫与又可之论的区别所在。

2 辨伤寒与时疫异

杨氏不仅辨温疫与温病的区别, 还进一步对伤寒与时疫之不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其认为伤寒与时疫不同, 并从感气、传变、证候、治则等几方面辨识如下。伤寒感天地之正气, 时疫感天地之戾气。医家认为, 伤寒与时疫, 有霄壤之隔, 但病情发展传至胃家时, 并用承气汤, 至是亦无复有风寒之分。推而广之, 是知疫邪传胃, 治法无异。故又可辨伤寒、时疫受邪之不同, 治法始异终同而又不同。杨氏认为, 时疫受邪与治法, 始终悉不外伤寒门径。特其间受邪之参错有殊, 治法之顺逆不一, 要之其理可一贯也。伤寒之邪, 由太阳而传阳明, 由阳明而传少阳, 所谓经证则递传也。至入阳明之里,

则无所传,惟下夺一法耳。在论温疫传变及证治时杨氏指出:时疫之邪,舍太阳直犯阳明。症见目胀、鼻塞、头重、口臭、气粗,兼有少阳之胸胁苦满,心烦喜呕,是阳明少阳合病也。少阳居表里之界,邪入里则寒,邪出表则热。故初则凛凜恶寒,继则纯热而不恶寒。其受邪也深,其见证也故缓。又可立达原饮。槟榔、厚朴、知母,治阳明药也。白芍、黄芪,治少阳药也。草果开发胃气,兼破胁下之结,阳明少阳互治药也。时疫邪气先入里,治宜攻里,承气诸药是也。里气通,余邪传为腑热,白虎诸药解之。再传而为燥结,承气诸药攻之。故解表为重,攻里为轻。必见谵语、潮热、汗出、硬满诸症,方主大承气汤。治伤寒之邪,由表而腑而里,其法从顺治也。治时疫之邪,由里而脏而表,即从治伤寒之法,从逆治也。通斯义者,则谓伤寒为万法之祖,不诚足启发千百世之聋瞶哉。或谓自汗、盗汗、狂汗,伤寒邪解之后恒有之。若战汗一证,时疫尤多,则宜专属时疫。对此,杨氏进一步加以发挥,惟疫邪阳明居多,必候邪毒攻下,胃气流通。然后少阳表里互结之邪,始从战汗而解,必然之理也。且《伤寒论·少阳篇》云:“凡柴胡病证而下之,若柴胡证不罢者,复与柴胡汤,必蒸蒸而振,却发热汗出而解。”振即战也。下后复与柴胡汤,以取战汗,本伤寒法也。惟时疫邪毒最重,传染于人,却与伤寒迥别。然受病者从口鼻而入,染病者亦从口鼻而入,皆不越阳明经。时疫受邪与治法,始终悉不外伤寒门径,其理可一贯也。

此外,杨氏对温疫与寒疫辨证鉴别之法进行了区分:温疫多见舌苔白而燥,口渴喜冷饮;寒疫多见舌苔白而滑,口不渴,或渴而喜热饮。温疫多先憎寒而后发热,发热则不恶寒,热与热两相合也;寒疫亦先憎寒,而后发热,发热而仍恶寒,寒与热两相争也。温疫则燥烦不眠,气粗口臭,扬手掷足,谵语发狂,阳性主动故也;寒疫则虚烦倦卧,身重头眩,神弱气微,郑声多怯,阴性主静故也。对寒疫治之之法,杨氏亦进行了精辟的论述:惟有驱寒辟疫,温经回阳,如严冬闭寒,雪压冰凝,端赖黍谷春回,积冻潜消矣。第真阳一点,镇摄坎宫,水火相济之妙。其专扶阳者,所谓阴从阳出,精生于气是也。亦宜兼养阴者,所谓阳根于阴,气化于精足也。此中消息精微,人命存亡,关系甚钜。故治三阴受邪之证,真阳虚而元阴未亏者,用辛温,专扶其阳,以御其阴,否则阴盛灭阳矣。真阳虚而元阴复亏者,用甘温,兼养其阴,以辅其阳,否则阳亢烁阴矣。里虚夹表者,解表必兼温里,扶正乃能驱邪也。里重于表者,温里不必解表,正旺而邪自溃也。通斯义者,可以悟阴阳互根之理,可以识标本定治之宜。济世活人,其庶几乎。杨氏治寒疫立“醒

脾饮”、“温经散寒饮”两名方。以醒脾饮治寒疫不发热,脉沉迟,或虚浮无力,悉现前论诸证,宜用辛温解散者;以温经散寒饮治寒疫壮热无汗,脉浮紧,无力无神,悉现前论诸证,宜用甘温佐表者。杨氏在《温疫论辨义·寒疫论》篇中除论证寒疫证外,还列举自己治寒疫 10 余则医案以证之。

3 治温疫创益胃三方

自《内经》详述脾胃之生理与病理之后,历代医家均认为,“土为万物之母”、“胃气为本”、“饮食自倍,肠胃乃伤”,其言治法则在“劳者温之”、“损者益之”等基础之上加以发挥。如李东垣,倡“脾胃内伤,百病由生”,以补中益气汤、升阳散火汤等论治脾胃虚弱、中气下陷、谷气下流。李东垣是详于脾而略于胃,自叶桂创胃阴学说,主张用甘平或甘凉濡润,以养胃阴,补东垣脾胃学说之不足。杨氏在继承诸家之论的基础上,不仅论述了各病程阶段温疫之邪伤神,更着意于胃气的发挥,特立“胃气论”:
“人身所赖以生者,水谷耳;水谷所赖以容者,胃耳。其水谷之津液,流布为精血,糟粕为浊秽者,皆胃气升降之权也。是故胃为水谷之海,五脏六腑之源,气血交会之所,即阴阳互根之基也。疫邪初起,从口鼻而伏于膜原,如阴翳四塞,白昼无光,胃阳为之不舒矣。疫邪中溃,从膜原而下趋胃府,若火燎原,不可扑灭,胃阴为之失养矣。治初起者,宜疏利,所以升胃中阳气也。治入府者,宜攻下,所以救胃中阴液也。然升阳气者,必兼救阴,所以防邪毒入府之亢燥也。救阴液者,必兼升阳,所以引邪毒出表之顺利也。要之斡旋阴阳,不可偏废者,诚以胃为养命之源故也”(《温疫论辨义·胃气论》)。

杨氏指出:“每见时师治疫,但务去标,不知固本,无论实证夹虚,莫辨属虚属实,以承气重剂,劫命者不少。即其证悉转为虚,渴为虚渴,烦为虚烦,热为虚热,脉为虚浮、虚数,犹复认虚为实,不知培养真元,反投寒凉疏散,甚至厥逆吐利,证变纯阴,六脉沉细,尚不敢议温补。坐令胃阴枯竭,胃阳消亡,谷食日绝,生机立戕,至死不肯任咎,比比皆然。……余目击心伤,特立斯论,以宣又可未发之蕴。复立益胃三方,以补前法所未备,而治疫之要领,悉概括于方论中,未始非活人之一助云”(《温疫论辨义·胃气论》)。由此可知,杨氏立“胃气论”主要是针对时世疗温疫,“但务去标,不知固本”之时弊而作,阐发了治疫病注意顾护胃阴的指导思想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刘炳凡,周绍明,程丑夫,等. 湖湘名医典籍精华[M]. 长沙: 湖南科技出版社, 2000: 353(本引文后所出现《温疫论辨义》

引文均出自该版本) All rights reserved. <http://www.cnki.net>

(收稿日期: 2009-03-17; 修回日期: 2009-05-13)

[编辑: 黄 健]